

科技帝国主义：全球治理问题的一个症结

张务农

(河南大学教育学部,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 我国加入WTO之后,“全球化”作为“帝国主义”的替代品登上了历史舞台,国内学术界便不再热衷于讨论帝国主义,而是聚焦于全球治理的问题。然而,抛开对“帝国主义”的重新考察并不能充分理解“全球治理”的难题。持续的贸易战显示帝国主义不仅持续存在,而且表现出新的特征。在贸易战中,对高端技术以及相应产业链的控制和垄断成为帝国主义最致命的手段,以高科技垄断控制世界政治版图、维持世界旧秩序并攫取超额经济利益成为帝国主义新的霸权形式。这一现象不仅是传统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无法充分解释的,甚至包括“文化帝国主义”、“生态帝国主义”,“科学帝国主义”等新的范畴也是无法充分说明的。尽管从源流上看,科技帝国主义的相关思想可以追溯到贝尔纳关于科技、教育和帝国主义兴起的相关论述,但一直以来,学界所使用的相关术语又各有偏重,不足以揭示当前的帝国主义新形态。“科技帝国主义”能够更好地揭示帝国主义借助于科技垄断对内进行控制、对外进行扩张,以维持和强化全球不平等贸易、经济、政治旧秩序的机制。在科技帝国主义的发展阶段,帝国主义控制了新技术革命最为关键的技术,而跨国公司从根本上依附于帝国的控制战略。因此,通过合作与斗争维护公平的贸易秩序,打破帝国主义的技术壁垒不仅是贸易议题,而且是全球治理的关键议题。

[关键词] 技术统治 科技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研究 贸易战 世界贸易组织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83X(2021)06-0071-11

日本学者渡边雅男在其论著“当代世界帝国主义的七个问题”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人们之所以对帝国主义的概念“讳莫如深”,一是因为“全球化早已作为帝国主义的替代品登上了历史舞台”,另则因为“这是一个没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时代”。^[1]而当前的学界,对“全球治理”问题的关注也远远盖过了对帝国主义的讨论。学者们更愿意提及并认可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描述的后帝国主义的场景,而不愿意去翻阅那些早已蒙尘的“揭示帝国主义及其命运的论著”。即便星星点点,仍有一些学者会论及帝国主义,但力量之微弱,只若漆黑夜

空中的萤火。我们果真生活在一个没有帝国主义的时代?在贸易战中,那些无视全球治理原则、任性妄为的国家权力背后隐藏着什么?不是借尸还魂的帝国主义吗?我们也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来研究帝国主义的最新形态,以探寻全球治理难题的根本症结。

一、“科技帝国主义”的概念源流、内涵与价值

(一)“科技帝国主义”的源流

早在1939年贝尔纳就关注到了科技、教育

收稿日期:2021-04-23;修回日期:2021-05-07

作者简介:张务农,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与教育管理研究。

与帝国主义兴起的认识，认识到技术是帝国主义扩张的前提和基础。^[2]日本科学史学者广重彻则指出，科学技术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殖民化的工具。^{[3] (P144)}美国技术史家希德里克在《帝国的帮凶——欧洲膨胀与技术》中指出，技术与帝国主义的相互关系，必须从帝国主义史和技术史两个方面进行研究，认为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兴起一方面表现在工业技术的进步及其影响，另一方面表现为欧洲人对亚非人民的统治与榨取，前者是帝国主义的手段，后者是帝国主义的目的。^{[4] (P2)}美国科学史家路易斯·佩尔森则研究了不同学科的知识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其在第18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关于“科学·医学·殖民地帝国主义”的主题报告中被认为首次提出“科学帝国主义”概念。^[2]此外，日本学者木本忠昭和加藤邦兴，以及澳大利亚科学史家罗伊·麦克劳德等，都对这一主题展开不同视角讨论，分析科学技术对帝国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另外，日本学者山口直樹于2000年刊文讨论“科学、技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本问题”，认为技术虽不构成帝国主义本身，但却是帝国主义崛起的秘密。^[5]

改革开放之后，即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整个90年代，国内学界也有著述分析科学技术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但主要是围绕“技术发展如何转换为帝国的强盛力量”这一视角。如有学者认为，帝国主义在“看似合理的交换过程”利用技术优势、通过“技术殖民主义剥夺别人的财富”，而且这比“旧殖民主义者利用洋枪、大炮剥夺别人的财富要容易得多”。^[6]最近，潘静如则从各类文本中分析了早期科技对帝国主义及现代生活的影响，剖析了坚船利炮在帝国主义扩张中的作用。^[7]也有研究分析了早期殖民地科学机构的性质，认为这些机构实质上是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背书。^[8]而在当代，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围绕科技发展与应用之规则、标准、体系等因素的竞争，构建科技联盟，打造能被本国强力控制的产业链，进而保持竞争优

势，抽取高额利润。随着这些国家不断加强对新科技联盟的掌控，西方基于技术联盟框架的体系日益成型，进而深刻塑造了“全球力量结构、国际格局与国际体系”。^[9]

总的来看，从科技视角分析帝国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一直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但在具体的术语运用上存在着不同，最常用的术语是“科学帝国主义”，也有用“技术霸权主义”^[10]“新技术民族主义”^[11]“技术殖民主义”等。这也导致具体的研究进路和研究内容存在着分野。新近的研究则主要讨论技术垄断、技术霸权、产业联盟等问题，虽然回避了“技术帝国主义”这样的术语，但也能够为本文提出“科技帝国主义”奠定思想基础。

(二) “科技帝国主义”的内涵

从词源上来看，帝国主义(imperialism来自于拉丁文的“imperium”，其含义包括：命令；诏谕；权力，政权；国家，帝国等。^[12]词源学揭示了“帝国主义”主要是围绕“强制性权力”来建构，这种权力赋予了帝国至高无上的权力和霸权，而且其权力不仅包括对内的“统治体系”，也包括对外的“霸权体系”。若以此为判断标准，帝国主义有着更长的历史。但也有学者认为，帝国主义属于资本主义，是指在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列强推行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政策、行为和主张”。^[13]因此，对于帝国主义起源于何时，涉及到如何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历史分期。^[14]而本文提出的科技帝国主义是指，以“科学技术”作为分析骨干，考察科学技术作为帝国主义的统治工具和霸权工具，进而考察帝国主义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命运。

现有研究在“科技帝国主义”的相关表述上尽管存在着差异，但大部分文献使用“科学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来阐释相关问题，但在阐释这一概念时往往又指涉“科学技术”。本文源流部分的梳理就主要是围绕科学技术发展对帝国主义形成和推动而展开的。但也有诸多研究仅限于科学问题，讨论较为纯粹的“科学帝国主义”，而未涉及技术帝国主义，最终导向

“知识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论域。这些研究多限于对科学研究活动领域本身的垄断和控制问题的观察，如有研究认为科学帝国主义是指在领域1产生的思想被不恰当地推广到领域2、3……的现象，^[15]也有研究认为科学帝国主义是西方的知识标准被推广到其他地区和民族的现象。^[16]这种解释路线更贴近知识生产领域本身的问题而非全球治理。也有一些研究谈及先进技术与霸权主义的相合关系，但也未明确使用“技术帝国主义”或“科技帝国主义”这一概念。^[17]

考虑到“科学帝国主义”倾向于围绕知识生产标准、组织方面展开研究，而非主要在全球治理和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层面讨论问题，本文未使用“科学帝国主义”这一表述；进而考虑到“技术”本身也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术语，他既可以泛化指涉自然的技术，也可以指人造的技术，还可以指技艺，因此本文在技术前面加了限定词，使用“科技帝国主义”这一术语，来分析帝国主义新的发展阶段，尝试构建帝国主义的新理论。本文认为科技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借助于科技垄断对内进行控制、对外进行扩张，以维持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高额垄断利润，并维持和强化全球不平等的贸易、经济、政治秩序的帝国主义发展阶段。

（三）“科技帝国主义”提出的价值

“帝国主义”并没有单一而恒久的定义：“经济上资本主义的新特征与政治上的革命立场之间的双向张力”，促进了“具有不同理论聚焦和实践关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产生，形成了政策论、阶段论、特征论和体系论等不同视角的帝国主义理论。^[18]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不仅反映了经济上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征，也体现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将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消费体系和“政策工具”，^{[19] (P27-31)}成为我们理解帝国主义的经典理论依据。

尽管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在今天对资本主义

国家的发展状况仍有相当的解释力，仍可作为我们处理与资本主义一系列关系的重要依据。但自列宁之后，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资本主义发展呈现了与列宁时代很大的不同。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理论也在这一进程中得到了多维发展，如“文化帝国主义”“生态帝国主义”“数字帝国主义”等概念的提出，使我们或多或少超越了以“金融”“托拉斯”“货币”“贸易”“战争”等核心词汇构建起来的“经济帝国主义”论域，从文化控制、生态掠夺和数据垄断等新视角观察帝国主义的新发展，从而得到一条更为完善的分析帝国主义形态的理论，一条更贴近于“帝国主义动力学”的致思路径，即帝国主义在不同的时代和条件下，其“强制性权力”运作的主要动力来源是不同的。因此，从帝国主义发展动力的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对不同阶段帝国主义赖以扩张的动力基础进行剖析，从而识别出帝国主义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特征，也可据此提出“帝国主义”的新概念、新理论。

在经典的或者传统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帝国主义不仅是“经济形态发展和演进的结果”，也是“政治和军事力量发展的结果”。^[20]而新的帝国主义理论，例如，“文化帝国主义”“生态帝国主义”“数字帝国主义”这些概念的提出以及相应理论的建构，则揭示了“文化霸权”“生态殖民”“数字垄断”等帝国主义展示其强制性权力的新的动力基础。

文化帝国主义作为帝国主义发展的动力机制，并非只是“由帝国主义国家向他国输出支持帝国主义关系的文化形式”，而是包含了文化帝国主义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一种话语”“作为一种民族国家的话语”“作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一种话语”和“作为现代性的批判话语”等多层内涵，^{[21] (P41-57)}共同揭示了全球化时代文化对帝国主义发展形态的重塑。相对于依靠强权政治和军事力量，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具有隐蔽性。尽管文化帝国主义在一段时间和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然而文化帝国主义并不会将资

本主义民主政治及其价值观带向全球,也并不会取得最终胜利。当前,作为帝国主义新的扩张基础的文化价值观,正因其无条件服从于帝国的利益而丧失“普适”标准,进而在全球丧失信任基础。这也印证了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所下的结论:“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会是对抗性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文化的努力与其推广能力的下降这两者之间的不协调”,使得“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22](P153)}

尽管文化帝国主义并不能导致帝国主义的全球性胜利,只是帝国主义新的发展策略。但经典帝国主义理论所认为的“资本之间的激烈竞争必然导致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已经不符合当代帝国主义的现实,帝国主义正在采取除了战争以外的一切可能手段继续着从未放弃的帝国主义梦想。尽管军事手段仍然是帝国主义最终的可依靠力量,但更多时候军事威慑只是一种姿态。当然,帝国主义的权力工具不仅仅局限于文化,还有数字资源、生态掠夺等,因而诞生了数字帝国主义、生态帝国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帝国主义分析路径。这些帝国主义概念与文化帝国主义不同,能够从新角度揭示帝国主义的扩张和控制工具,进而解释为什么目前全球充斥着知识产权纠纷、数据流通的障碍以及生态治理的重重难题。

上述解释范式,是不同于经典帝国主义的理论解释范型,不再将帝国主义归结为强权政治(主要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也不再从经济视角将帝国主义归结为货币体系(石油美元体系),而是另辟蹊径。尽管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强权政治和以石油美元为基础的金融霸权依然存在,但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各种帝国主义扩张工具交织在一起,力量此消彼长。在当今贸易战中,也可以观测到帝国主义新的特点。就中美贸易战而言,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新阶段与帝国主义新形式之间的

一次重要交锋;是帝国主义扩张与发展中国家反扩张之间的一次冲突。在这次漫长而复杂的冲突中,其冲突形式无论是传统的帝国主义理论还是文化帝国主义、生态帝国主义、数字帝国主义等理论范式都很难直接彻底解释清楚。在贸易战中,知识产权、数字资源、生态环境等诸多工具都是帝国主义实施全球控制的表层工具,深层次工具则是帝国主义国家借助于其先发优势建立起来的技术优势和技术垄断。在贸易战中,我们看到帝国主义正试图依靠技术优势永远控制全球的生产结构和秩序,以维护其在产业链顶端的利益。随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科技的全面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帝国主义”旧秩序的根基,导致帝国主义在技术管控领域全面收缩,不惜采用违背世贸规则、动用国家机器的方式维护其技术优势。因此,我们尝试提出“科技帝国主义”概念,以阐释在新的历史时代,帝国主义扩张和维护全球旧秩序的方式。

再者,提出“科技帝国主义”这一概念,不仅是基于“帝国主义动力学”这一分析视角,也是基于对帝国主义发展历史演变的观察: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时期才有的,垄断组织产生之前就存在着帝国主义,此时的帝国主义是以政治、军事力量作为其直接扩张和维护帝国秩序体系的主要形式。垄断组织出现之后,经济组织形式开始成为帝国主义扩张和控制的主要形式,但在垄断组织初期,政治和军事力量仍然是帝国主义主要的扩张、控制工具;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正是帝国主义垄断经济组织和军事政治组织矛盾纵横交织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尽管美苏两国军事力量达到了人类新的高峰,人类面临的战争威胁空前未有,但真正大的战争从未发生,帝国主义最终依靠经济手段的联盟和扩张击垮了问题重重的苏联。该阶段也是“经济帝国主义”的兴起和黄金发展时期,美元取代了金本位,彻底巩固了帝国主义的经济霸权基础。在苏联解体后,帝国主义基本实现了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全面

渗透和控制。

石油美元让人们意识到、并一直认为金融霸权是帝国主义的主要基础，但自20世纪90年代，帝国主义的新形式已经开始全面孕育，这就是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并延伸至21世纪的互联网革命，以及与之相伴的电子信息工业革命。这一革命的结果就是帝国主义以其在芯片、手机等操作系统等领域建立起来的无与伦比的技术生态系统，不必动用政治军事力量，仅仅用技术制裁的方法就可以使大多数国家经济陷入瘫痪。如果说金融制裁并非万能，贸易国之间仍可以货易货，在一定程度上回避石油美元，或者采用其它币种交易，帝国主义在必要时必须动用军事封锁甚至发动战争的话，那么技术制裁使其他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取代方案，顶尖的芯片和操作系统通常被少数几家企业垄断。帝国主义根本无需战争，就可以实现对对象国的全面制裁和控制。也正是基于这一社会历史的现实，我们认为现在是“科技帝国主义”的发展阶段。帝国主义为了建立起维护其利益的秩序，进行所谓的技术控制，这种手段看似比任何此前的手段都有效。

二、“科技帝国主义”的特征、扩张与控制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的历史时代和全球化语境中提出“科技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并非是完全用“科技帝国主义”代替其它“帝国主义”。“生态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数字帝国主义”都可以在一定语境下和一定层面上揭示帝国主义新的表现形式。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和历史发展阶段的论断依然有效，经济垄断组织当今依然是帝国主义的重要支柱。金融资本对世界生产体系的控制有增无减，资本输出仍然是帝国主义攫取世界利益和控制世界经济生产的重要方式。^[23]“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

野来看，我们仍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24] (P66)}“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没有过时”。^{[25] (P6-7)}但是当代资本主义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特点，也需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新特征去重新把握“帝国主义”这一概念。若说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的十余年，帝国主义技术霸权的布局 and 扩张还是隐性的，那么自贸易战以来，“科技帝国主义”的特征、扩张与控制方式则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并且成为当今帝国主义最主要的特征。

尽管2000年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严重的互联网泡沫，但新技术革命并没有随着泡沫的劈裂而消失，反而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涅槃式的重生，发达资本主义从而奠定了史无前例的足以控制全球的技术基础。这其中就包括，帝国主义利用技术优势控制了包括全球的全部13台互联网根服务器，以及独一无二的电脑操作系统和芯片设计制造技术和相应的产业链，由此奠定了帝国主义新的“强权政治——技术霸权”基础。^[17]

（一）科技帝国主义的关键特征

科技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最新形态，在这一阶段，军事侵略、政治控制、文化控制都不再是帝国主义行使强权的有效手段或最佳手段。在民主价值观的外衣下，军事手段和强权政治都非最佳选择，因为这要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经济成本和巨大的军事风险。而文化的输入和文化控制效果也不理想，帝国主义的颜色革命收效甚微，不仅未能有效输出帝国主义的价值观，反而导致文明的冲突持续加剧，文化的同质化只是帝国主义的虚幻。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乌克兰等地区的动荡为帝国主义带来的收益非常有限，甚至带来了沉重的管控负荷。而生态帝国主义、数字帝国主义，根本都建立在“科技帝国主义”这一当今帝国主义更为有效的形式和深层结构之上。不了解技术霸权，就无法彻底理解并解决生态帝国主义、数字帝国

主义的问题。

1. 帝国主义控制了新技术革命最为关键的技术

虽然在WTO贸易规则下,以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技术跨国转让,但帝国主义一直控制着最关键的技术,而且通过在这一领域深耕细作,通过技术生态系统的构建、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筑了其他民族国家难以跨越的门槛。尽管芯片等高新技术设计和生产,并不局限于一国、一家公司,但帝国主义通过不断的控股等方式取得了对世界范围内多个同产业链公司的控制。当一个民族国家在遭遇到技术限购和制裁而转向其他供应商时,会发现这些供应商的控股权归帝国公司所有,而且控股比例超过一定限度即要受帝国法律的约束,否则就要受到帝国的制裁。事实上,在之前人类历史的任何时代,哪怕是最辉煌的帝国,想靠一国之力动辄制裁一个国家或者技术封锁一个国家都是不现实的;然而在当今世界这种神话却在不断上演,原因就是帝国主义对关键技术的高度垄断和广泛控制,而现代社会恰恰是一个高度技术依赖的社会。当技术成为了社会的经脉,当以电子流形式存在的数字流动与智能化运算成为当今社会各行业的血液,世界上归属于帝国主义的一家公司或数家公司就控制了技术的命门,就能实现对世界广泛和威严的控制。

2. 跨国公司从根本上依附于帝国的控制战略

一般来看,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在资本主义的构架中,市场主体具有经营自主性。资本主义也一直被誉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政府不对经济活动进行直接干涉。表面上看,跨国公司作为生产活动的主体并不受制于帝国主义国家,它们在生产领域享有高度的自治,他们只为获得“利润”而存在,这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共识,因而学术界也不再热衷于继续为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贴上帝国主义的“标签”。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的自由裁量权仍然是有限的。自由市场在帝国主义的根本利益面前不值得一提,帝国主义可以随时威胁

使用“国家紧急状态法”限制自由市场行为。^[26]

尽管在当前中美贸易战中,跨国公司可以联名上书美国联邦政府要求解禁对华贸易限制,但他们终究要屈服于帝国的法律。而这些法律正是由这些跨国公司参与、为了维护帝国整体特权和利益而事先制定的。因此,跨国公司基于市场行为和企业利润而对华为等国公司释放出的善意,以及联名要求政府解禁技术限制的所谓积极信号终究是表象,^[27]跨国公司在关键时刻必然依附于帝国的控制战略。

另外,根据列宁帝国主义理论观点,垄断的资本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竞争的必然结果,跨国公司巨头们作为市场竞争的胜利者必然进入帝国政治决策层,并构成帝国政治的主要影响力量。在当今经济形态下,传统产业日渐式微,新技术不断迭代,落后的企业被不断淘汰,技术成了当前经济活动的主宰。那些靠技术创业和在技术迭代中脱颖而出的精英们重塑了帝国政治阶层的基础。于是,技术寡头和资本主义国家合体,构筑了新的帝国主义形态。那些依靠技术优势在国际间纵横捭阖的跨国公司,不仅是帝国主义国家经济意义上的肢体,同样是他们政治的器官。跨国公司一方面是技术垄断组织,一方面又是依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的附庸。这就是为什么联邦快递能够公然违背自由市场的精神,将华为公司的包裹寄回帝国进行所谓的“调查”。^[28]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高通、英特尔、微软、谷歌等帝国公司一方面出于对利益的贪婪急于恢复与华为等国实体公司的商业往来,一方面又受制于帝国的法律,无法做出自主裁决。

(二) 科技帝国主义的扩张与控制

科技帝国主义的扩张方式是悄然而富于远见的。以互联网革命为构架的产业革命在20世纪70、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90年代初露峥嵘。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甚至在1911年就已经成立,英特尔公司则诞生于1968年。1975、1976、1977年微软、苹果公司、甲骨文公司相继创立,而高通和谷歌则分别成立于1985、1998

年。即在美苏争霸高潮迭起的时代，整个世界仍然沉浸于传统重工业的痴迷和对核武器的崇拜时，帝国主义新的技术形态就已全面孕育和疯长。而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可以看作是传统军事技术全面败给新兴信息化军事技术的重大标志。而到了21世纪初，美国在信息技术领域全面形成了以“微软、苹果、谷歌、IBM”为代表的“互联网应用层技术公司”，以“微软和甲骨文”为代表的软件操作系统公司，以及以“高通、德州仪器、博通、镁光”等为代表的高科技硬件设备公司，构成了对互联网高端技术的全面垄断与控制。这些高科技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工业发展的结晶，另一方面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战略的成功。冷战时期与美国几乎平起平坐的苏联红色帝国主义，在灰飞烟灭之后除了重工业之外，连轻工业都无法自足，在信息技术领域与美国更难相提并论。互联网在世界普及后，人们才发现，互联网的软件、芯片、服务器等关键技术无不在帝国的控制之下。在这种情况下，技术霸权比金融霸权和军事霸权都更加致命，也更容易运用。军事和金融封锁无非是在主权国家的边界线上筑起壁垒，而互联网技术的封锁，无疑可以将另一个国家隔绝于旧的时代。而这些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对于工业基础薄弱、仍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难以企及的，他们没有选择，唯有纳入帝国的技术控制体系。

在遍布全球的互联网技术构架中，发展中国家自然而然地处于技术收益链的低端，只能靠技术代工或者低端技术服务赚取微薄利润，而帝国的公司依靠技术垄断和专利授权每年坐收动辄成千上万亿美金的利益。也有国家，例如韩国和日本，也发展出了一些关键技术，以至于这些国家的芯片技术可以取代美国产品。然而事实上，在贸易战中也可以发现，这些芯片公司不同程度被美国的公司控股，并受到美国法律制约。而日韩这些帝国主义的外围国家之所以能够顺利发展起来，掌握一些关键技术，是因

为这些国家有较好的工业基础，例如日本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而韩国作为美国军事上的附庸国，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了与帝国主义国家的联盟关系。科技帝国主义，正是这样一个技术和政治结合体，通过围绕帝国构建起来的层层联盟国家，实现了对全球的技术统治。

这种技术统治是非常有效的。首先，帝国主义的军事冒险有较大的政治代价，也面临着人道主义的挑战，这与作为帝国主义“糖衣炮弹”的“民主价值观”存在诸多矛盾。而帝国的金融工具也不总是那么有效，绕过多边贸易规则WTO同样有较大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一些国家甚至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回避帝国的金融体系，甚至一些国家和国家联盟可以推出另外一种强势货币，进而威胁帝国货币的霸权基础。而且帝国的货币金融工具并不一定奏效，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帝国的金融寡头血洗东南亚金融市场，但却折戟中国香港。就目前来看，帝国的技术控制手段无疑是最为有效的，帝国在对他国发动战争时，可以关闭一国的互联网服务，关闭GPS，从而使敌国的国民经济和军事机器完全瘫痪。而中国这样的大国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多年潜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帝国主义的技术封锁，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经济体量的剧增，与帝国主义形成了在经济结构中交融的态势，帝国主义的金融控制工具已经在快速式微。在军事方面，关闭GPS信号，中国还有北斗可用，而且对中国这样的拥核民族国家发动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因而通过技术优势展现帝国主义霸权力量就成为最佳选择。技术对帝国主义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会不择手段消灭一切处于“萌芽”和“幼年”时期的“技术威胁”。目前帝国主义打造芯片等产业联盟，加强技术封锁与控制，正是维护帝国主义霸权的举措。帝国主义从来不会出让根本利益，目的就是让他国永远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从而保证帝国持久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并将整个世界纳入帝国主义的政治、生产体系中。

三、从科技帝国主义看帝国主义的未来

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29] (P704)} 这种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断，放在“科技帝国主义”的分析框架仍然有很强的说明力：帝国主义借助新技术革命获得的技术优势，对世界经济与生产的控制进一步加强，而且借助于技术的血脉和高科技垄断贪婪地掠夺世界财富，寄生的特点更加明显。然而也可看到，帝国主义的城堡只隔着一条技术的鸿沟，帝国主义在想方设法保护自身技术优势，不择手段试图做最后挣扎；然而一旦发展中国家突破了帝国主义的技术垄断，它就会轰然倒塌。这是对科技帝国主义命运的基本判断。虽然科技帝国主义对世界的控制更广阔、更深刻，但技术控制与枪炮的控制与石油美元的控制相比较起来也显得更为脆弱。知识和技术的全球化流动与帝国主义试图垄断技术的企图之间存在着明显悖论，控制难度越来越大；在教育交流、文化交流、科学研究合作以及跨国公司的当地化经营中，对技术的长远垄断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这预示着帝国主义终将随着技术帝国的倒塌而崩溃。

但同时也应看到，帝国主义在列宁预言的垂死阶段不断花样翻新，更换帝国对全球格局的控制方式，也在不断延长帝国主义的生存期，这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当帝国主义的枪炮和核武器射程不能有效发挥其威力时，帝国主义建立了石油美元霸权替代了金本位的货币体系，石油美元与军事强权相结合，深化并加强了帝国主义霸权。但帝国主义依靠金融创新，寄生于世界的方式不断破产，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不仅损害了世界经济，也损害了帝国主义的“形象”，显现了新帝国主义的贪婪与腐朽。^[30] 以至于许多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开始寻求脱离美元的出路，以摆脱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买单的魔咒。但帝国主义却早已建立

了使发展中国家更难以摆脱的技术霸权，并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帝国主义的上述霸权形式不断叠加及主要形式交替过程，也说明帝国主义并非一个自取灭亡的资本主义阶段。相反，他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尽管从科技视角看，帝国主义垂死的状态更加明确，但必须警惕新的帝国主义霸权形式出现。

当前，处理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仍是全球治理的重要难题，帝国主义仍是建立公平、平等、协商、共治全球新秩序的主要障碍。帝国主义借助于互联网革命，持续扩大并固化了帝国的既有利益。帝国主义试图对世界生产体系、财富分配结构进行控制，并永久保持这一力量优势和控制优势。然而，这种新的控制形式既史无前例地有效，也史无前例地脆弱，因为在互联网之上流动的不仅仅是来自帝国的控制的技术代码，还有扩散的技术。这些技术一旦被扩散，失去西方的控制中心，就会使帝国主义的血脉转换为全球化时代各国平等交流的通道。然而前提是，发展中国家应当尽力抓住历史机遇，分享人类技术的成果，并在技术领域充分展开与帝国主义的竞争，才能抹平技术鸿沟，消解帝国主义的技术控制基础。但这一过程仍然存在诸多波折。

一方面，帝国主义需要进行全球产业布局，进行资本输出，将技术网络和跨国公司的分公司、甚至总部开设到全球各个角落，借助于全球市场以取得全球的最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并尽可能降低运输、关税等销售成本。这不可避免地产生技术流动和转让，这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帝国主义的技术霸权基础。但帝国主义在这方面是极其谨慎的，他通过主导的国际贸易规则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自己的技术优势进行严密保护。在上述矛盾对立过程中存在着动摇科技帝国主义基础的潜在力量；而发展中国家与帝国主义的共处和斗争则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外部矛盾，事物内部和内外部分存在的主要矛盾共同推动事物发生革命性的变化。^[31] 这从客观上说明帝国主义的技术霸权模式会因为其生

产模式的内部矛盾而走向终结，当代帝国主义的生产模式决定了技术转移不可避免，但帝国主义总是试图控制这一进程，只愿转让低端技术，从而保持自身技术优势。因而在帝国主义的产业转移中，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生产场所、人力资源和市场，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却并没有获得想要的生产关键技术。

另一方面，一旦哪个国家的民族企业发展良好，跨国公司就会对其虎视眈眈，对其兼并，帝国主义就在这种对外扩张、对内保护的状况下享受着帝国技术霸权带来的巨额利益。这种帝国的利益模式在原有的全球贸易规则（WTO）中也能够得到有效保护。然一旦帝国主义的技术垄断被打破，发展中国家借助于劳动成本、地域优势以及不对称技术优势，生产出比帝国主义更有竞争力的产品，帝国主义的生存危机就来了。这能够解释为何WTO成立以来，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风平浪静时，世贸规则有效维护了帝国主义的利益；波涛汹涌时，帝国主义的技术和生产优势被挑战，因而帝国主义就不择手段试图打破旧规则，重新调整巩固自身优势。当前的贸易战，正是一次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与发展中国家间利益格局的一次大调整、大动荡。在这一动荡过程中，关税战是为了保护帝国主义国内生产、吸引优质生产能力从世界各地回潮国内，打击竞争对手产品竞争优势，客观上抑制帝国主义国家技术的流失。

上述分析也能证明，维护世界贸易秩序的重要性。维护世界贸易规则正是维持发展中国家与帝国主义战略平衡的重要基础；维护公平、多边开放的贸易规则能够从内外部矛盾方面促进帝国主义的式微。当然，指望帝国主义主动和彻底的技术转移是不现实的，且现在的世界贸易规则总体来看对帝国主义更为有利。^[32]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在维护既有世贸规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努力推动世贸规则向更公平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要抓住机会提升自身技术创新能力，主动参与世界生产分工，先从建

立局部的技术和生产优势开始，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因此，发展中国家不仅不能脱离帝国主义的技术生产体系，而且要积极地参与他们的生产分工，积极与帝国主义合作，在合作中斗争、在斗争中合作。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总体落后、技术基础薄弱，因而国家间的联合技术开发十分必要；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参与帝国主义生产体系程度较深、依附性较高，这也需要发展中国家在帝国主义技术殖民体制中的再次觉醒，加强南南合作，共同推动国际新秩序。

总之，一旦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霸权被消解，其制定贸易规则的能力就必然被弱化，世界贸易秩序必然更加公平，世界生产秩序也必然更加合理，帝国主义金融霸权的基础也将不复存在，军事霸权也必然消失于无形，帝国主义时代将终结，人类将进入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时代”。^[33]然而这一进程不仅是一个“治理”的问题，也是一个“斗争”的问题。^[34]

参考文献：

- [1]渡边雅男，高晨曦. 当代世界帝国主义的七个问题[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8(1): 98-108.
- [2]梁波，陈凡，冯炜. 国外关于技术与帝国主义研究之述评[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 175-177.
- [3]广重彻. 科学的社会史[M]. 东京：中央公论社，1974.
- [4]希德里克. 帝国的帮凶[M]. 东京：日本经济评论社，1989.
- [5]山口直樹，Naoki, Yamaguchi, et al. 科学·技术与日本帝国主义—满铁中央试验所の活動をめぐって[C]// 第二届中日机械技术史国际学术会议，2000: 51-54.
- [6]赵红州. 加强基础科学研究 抵制技术殖民主义[J]. 科技潮，1994(1): 10-11.
- [7]潘静如. “现代性”与“科学帝国主义”初体验——论近代早期的火轮船诗[J]. 文学遗产，2021(2): 178-191.
- [8]姚勇. 科学帝国主义与尼泊尔、印度的卡利河边界争端[J]. 南亚研究季刊，2021(1): 126-138, 159.

- [9]唐新华. 西方“技术联盟”: 构建新科技霸权的战略路径[J]. 现代国际关系, 2021(1): 38-46, 64.
- [10]李在权, 赵玉. 世界秩序中的“技术霸权主义”趋势[J]. 国际经济评论, 1992(9): 15-17.
- [11]王稳, 仲鑫, 马光明. “新技术民族主义”还是“技术霸权主义”[J].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06(4): 5-9.
- [12]李兴耕. 俄学者科洛米伊采夫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J]. 国外理论动态, 1997(14): 110-112.
- [13]周芬, 张顺洪. 帝国和帝国主义概念辨析[J]. 史学理论研究, 2021(2): 147-156, 160.
- [14]鲁保林. 新帝国主义的形成、特征与积累模式[J]. 教学与研究, 2021(3): 59-69.
- [15]Uskali Mäki. Scientific imperialism: difficulties in definition,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J].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13, 27(3): 325-339.
- [16]Popov, Y V, Popova N G, Kochetkov D M. On “scientific imperialism”[J]. Russian Education & Society, 2019, 61(4): 188-205.
- [17]李盛竹. 美国跨国公司国际竞争战略研究——基于新“政治—技术霸权”背景[J]. 国际经贸探索, 2010, 26(7): 50-55.
- [18]朱亚坤. 何谓“帝国主义”? 语境、面向与反思——主要基于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评析[J]. 国外理论动态, 2019(4): 52-63.
- [19]查戈洛夫.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发展[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1.
- [20]戴卫华. 帝国主义动力学中的国家角色[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6): 8-15.
- [21]汤林森. 文化帝国主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22]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3.
- [23]邓久根, 冯来兴. 资本输出方式与核心国家的更替——纪念《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创作100周年[J]. 当代经济研究, 2017(1): 16-21.
- [2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 [25]王伟光. 开辟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境界[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 [26]观察者网. 美国再次威胁或启动“国家紧急状态”限制中国投资[EB/OL]. (2018-04-20)[2018-09-17].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98239891189499590&wfr=spider&for=pc>.
- [27]观察者网. 当着特朗普面, 谷歌高通等要求及时解禁华为[EB/OL]. (2019-07-2)[2019-09-17].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39815606125227888&wfr=spider&for=pc>.
- [28]路透社. 华为发现联邦快递将华为包裹转运美国, 内含重要文件[EB/OL]. (2019-05-28)[2019-09-17].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KkL8u>.
- [29]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 列宁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30]舒展. 国际金融危机与“新帝国主义”的腐朽表现——兼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9(2): 60-66.
- [31]刘林元. 《矛盾论》与马克思主义矛盾动力理论体系的形成[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0, 16(2): 3-8.
- [32]姜作利. 试析WTO特殊差别待遇规则“硬化”的合理性——发展中国家的视角[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4): 68-79.
- [33]陈向阳. 习近平总书记的全球治理思想[EB/OL].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7-08-17)[2019-09-12].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817/c83859-29476848.html>.
- [34]以斗争精神坚持底线思维[EB/OL]. (2019-04-29)[2019-09-17].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429/c40531-31056650.html>.

【责任编辑 刘红娟】

Technological Imperialism: A Crux of Global Governance

ZHANG Wunong

Abstract: tepped on the historical stage.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are no longer keen to discuss imperialism, but focus on the issue of global governance. However, putting aside “imperialism” can not fully understand the problem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 continuous trade war shows that imperialism not only persists, but also shows new characteristics. In the trade war, the control and monopoly of high-end technology and corresponding industrial chains have become the most lethal means of imperialism. The new hegemonic form of imperialism is to control the world political territory, maintain the old world order and seize excess economic interests with high-tech monopoly. This phenomenon cannot be fully explained

not only by traditional “economic imperialism”, but also by new categories such as “cultural imperialism”, “ecological imperialism”, and even “scientific imperialism”. Although the relevant idea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mperialism can be traced back to Bernard’s relevant discussions on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the rise of imperialism, the relevant terms used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been biased, which is not enough to reveal the current new form of imperialism.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mperialism” can better reveal the mechanism of imperialism’s internal control and external expansion with the help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onopoly, so as to maintain and strengthen the old order of global unequal trade, economy and politics. In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mperialism, imperialism controls the most critical technology of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fundamentally depend on the Empire’s control strategy. Therefore, maintaining a fair trade order and breaking imperialist technical barriers through cooperation and struggle is not only a trade issue, but also a key issue of current global governance.

Keywords: technological domination; technological imperialism; capitalist research; trade war;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上接第59页)

clustering to the industry level for regression, the results are still stable. Secondly, the robustness test of the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shows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upstream degree of trade is on an upward trend during the inspection period from the quantile regression. In the sub-sample regression, compared with the northwest region, the upstream degree of trade in the southwest region has a greater positive effect on the quality of export products. At the same time, compared with the low-tech industries, the upstream degree of trade in the medium and high-tech industries has a more obvious promotion effect on product quality. Finally,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mediary model test shows that the upstream degree of trade promotes the upgrading of the quality of export products in the western region by improving the technical level and labor productivity. Encourag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echnical level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and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ealize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region.

Keywords: trade upstream degree; quality of export products; GVC embedment location; heterogeneous effect